

中國文字 為什麼必須改革

鄭林曦著
東方書店出版

中國文字爲什麼必須改革

鄭林璣著

上海 東方書店出版

中國文字為什麼必須改革

1952年9月第一版

1953年2月第三版

印數 5001—10000 冊

鄭 林 曜 著

東 方 書 店 出 版

上海山東中路 136 號

通 聯 書 店 發 行

上海山東中路 128 弄

毅 華 印 刷 所 印 刷

上海海寧路 697 號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每冊定價 4000 元

目 次

第一編 中國文字的發展規律和實用情況	1
中國文字有沒有階級性，可不可以改革？	2
工人的文化跟技術進步的一個關鍵問題	17
王二莊農民識字情況調查	20
第二編 文字改革和拼音文字	29
文字改革是一個迫切的現實問題	30
中國文字為什麼必須走向拼音化？	35
普及教育所迫切需要的幾項文字改進工作	57
讀勞乃宣的“簡字叢錄”	60
用少數漢字能造成無數的詞兒嗎？	65
第三編 用拼音文字來寫人民的語言	71
拼音文字寫什麼話？	72
新文字一定要寫人民的語言	79
的確有詞兒連寫的必要！	80

第四編	關於新文字和新文字運動	85
開闢新文字的實際用途		86
北方話拉丁化方案是按照什麼音系拼音的?		87
關於修改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一些問題		93
<hr/>		
編後的幾句話		105

第一編

中國文字的發展規律和實用情況

中國文字有沒有階級性，可不可以改革？

——紀念斯大林著“馬克思主義

與語言學問題”發表兩週年——

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這一偉大著作傳入中國後，促使研究或者關心中國語文問題的人們在陽光照耀下從新考慮有關中國語文的許多根本問題。中國文字到底有沒有階級性呢？它會不會突變？如果不會突變，你們提倡文字改革還有什麼意義？除開口頭上的談論外，雜誌上對此也有所討論。“人民教育”和“中國青年”等雜誌，都會收到過讀者提出來的這一類問題。

中國語文研究者和文字改革運動者必須試着來解答這些原則性問題。如果不能很好解決的話，我們在文字改革運動的實踐和中國語文的研究上，就時時會發生疑難，遭受誤解，不能快步前進。在接到這類問題後，我們有幾位研究中國語文的人曾經討論過幾次，也個別寫過一些簡單的答覆。但是像這樣大的問題，決不是簡單的幾句話能夠說得明白的。現在由我執筆根據我們討論所得的初步意見試對這兩個問題加以闡明。提法和解釋都不一定對，寫出來只供參考，並希望關心中國語文問題的朋友們大家來討論。

一 中國文字到底有沒有階級性？

文字，是書寫語言的一套記號體系；通過這套記號體系，人們把語言記錄下來，變成可以用眼睛看，嘴巴讀的東西，因而能够遠距離地傳遞，大量地印刷散布，並且能够留存久遠。文字，正是用它的這些特點給社會服務的。

從這方面說，文字和語言一樣，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一種“工具、武器，人們利用它來互相交際，交流思想，達到互相瞭解”。（引自斯大林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下面凡是不加說明的，都一樣。）文字，在文明社會裏逐漸成為進行生產，建立經濟關係，進行政治、文化鬥爭和日常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東西了。它和語言一樣，既不可以列入社會的經濟基礎一類，也不可以列入社會的上層建築一類，又不是兩者之間的中間現象；它是和生產工具相似的社會交際工具。過去有些人不把文字當做社會交際工具，倒拿它當做文化本身，當做社會的上層建築的一種，認為一個民族的文字是神聖不可改變的。按照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觀點來看，那顯然是錯誤的。文字不是上層建築，因而並不跟着社會基礎的改換而立即改變。而且因為長遠保存是它的特點，文字比起語言來變革得更慢也更難。一個民族的文字，就它作為交際工具的這些性質來說，是可以滿足民族內一切成員的需要的。只要學會了它，誰都可以使用。封建階級可以拿來寫作聖經賢傳，宣揚封建道德；無產階級也可以用來介紹馬列主義，傳播革命思想。文字可以滿足社會各階級的需要，因此，按照它的本質來說，文字是全民性的，不是階級性的。

拿漢字來說，也是如此。漢字是中國社會長期發展過程中的產物。漢字是識字的人們用來互相交際，交流思想，以達到互相瞭解的工具。它對於漢民族的形成和團結一致有過不可磨滅的貢獻。漢字在建立中國古代國家，保存和流傳漢民族的優秀的科學、文藝的著作，進行政治、思想、文化活動上有着很大的功勞。許多生產經驗，社會鬥爭經驗，靠着它保存了下來。民衆寫信，記賬，出廣告……等等日常生活，到現在還不能不使用它。對於各個階級來說，歷代王朝的封建貴族固然曾經用它宣揚過忠君孝親，三從四德等封建道德和敬神事鬼

的迷信思想；可是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軍却也會拿它來出布告，寫法律，宣傳一些在當時有進步意義的思想。到五四運動以後，毛主席寫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宣傳人民革命的道理，也還是用的這一套文字。由此可以知道，漢字並不限於替封建階級服務，它也可以替工農人民大眾服務。據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來推測，漢字已經有四千多年以上的歷史了。在這樣長遠的時期中，漢字的記號體系發生了種種變異，可是這些變化可不一定是跟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動相一致的。它的表意的體系，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改變；中國的社會經濟基礎，却已經由奴隸到封建，由封建到半封建，由半封建到新民主主義，變了好幾次了。社會的發展給了文字的發展很大的影響，但是漢字却不是上層建築，並不跟着基礎的改換而立即變化。就漢字可以替漢民族的社會各階級服務來看，它本質上是全民性的，不是階級性的。就算是經過文字改革，用一種新的文字來代替了現有的漢字，那一種新的文字，也必須取得社會各階級人民大眾的認可，能替社會各個階級服務，才成其為正式的文字；單單只代表某一個新興階級，光替這個新興階級服務的文字，是不會存在的。因此，改革後的中國新文字，也仍然是全民性的，不是階級性的。

在一位讀者寫來的信件裏，他認為漢字是“遠離勞動人民而為剝削階級服務的”，並且說：“我認為它已有很明顯的階級性”。根據上面說的理由，我們認為這種說法是和漢字實際的歷史情況完全不符合的，因而也是不正確的。自然，這種說法，也並不是由這位讀者首先提出來的。在斯大林論語言學的馬列主義的著作發表以前，有不少人是這樣認識的。這種錯誤的認識，今天應當改變。

但是，看了上面的意見，人們也許會問：難道過去封建統治階級壟斷漢字不是事實嗎？漢字替工農大眾服務，能像替封建貴族、地主

階級服務得一樣好嗎？我們認為在基本上肯定了漢字的全民性質以後，這些問題仍然值得討論討論。

斯大林同志告訴我們：“社會現象，除了這個共同的東西（按他指的是“替社會服務”——引用者）還有着自己專門的特點，這些專門的特點使社會現象互相區別，而且這些專門特點對於科學最為重要。”文字既然是一種社會現象，也就有著自己的專門的特點，值得加以具體地分析研究。當研究文字的社會性質的時候，我們不僅要看到它和語言共同的地方，而且要看到他們中間不同的地方。

文字，就它的社會性質來看，有些什麼不同的特點呢？

第一、就文字的發生來看，文字和語言不同，它不是跟着社會的產生而產生的，它的資歷淺得多。世界上已經發現的古代文字，例如中國的甲骨文，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巴比倫的蘇末人的楔形文字等，都不過是四五千年以前的社會產物。最大胆的推測，也沒有說它們是古老到一萬年以上的。直到現代，還有許多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字。比方中國境內的民族不下五六十個，而現有文字不過十三、四種。所以文字不能夠看作是和語言完全相同的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在社會中什麼人需要和有條件學會使用文字，什麼人不需要或者沒有條件去使用文字，是由他們所從事的生產性質，所處的社會經濟、政治地位來決定的。認為一切社會成員都有受識字教育的必要，是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以後，才按照工業生產對工人的需求，民主政治對選民的需求提出來的。而要真正作到這一點，却必須到社會主義社會才有完全的可能。在古代，使用文字只是少數“巫”（司占卜祭祀的人）和“史”（司記載氏族或國家經歷的官兒）的事情。比方說，西康彝族識字的“比摩”（類似巫），現在還是由少數“娃子”（奴隸）擔任的。不完備的象形彝文，主要是由他們拿來寫經占卜用的；多數彝人

並不會用。從安陽地下發掘出來的最古的漢字（甲骨文），大部分也正是記占卜事情的小辭，一小部分是史實的記載。所以我們一定不要設想文字在產生的時代就是供全體社會成員使用的東西。不，使用文字的最早只是少數專業的人。在原始氏族共產社會，現在還不能證明是使用文字的。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却有很多古代遺物，證明文字這個工具曾經是由統治階級和他們的巫、史之類人物所掌握。商、周兩代的鐘鼎等青銅器物的銘文，大多數是記載的王公大臣們立功受賞一類的事情。埃及的古文字，也多記載宮廷事物。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出：文字，在它產生的最早時期，就容易被統治階級和少數專業人員所壟斷，不能夠像語言一樣人人能說，個個會用。它的應用和服務的範圍是有限制的。

第二、文字的制作，在階級社會裏，要受一定階級的世界觀的影響，並受整個社會生產和文化水平的限制。文字的最初的創造者可能是直接參加勞動的人，這還需要多找證據。但是就已經曉得的一些文字的歷史看起來，凡是較有系統的文字，總是要經過一定的專業人物的創製、整理或增刪，然後由一定政治力量來提倡應用，才能成為社會公用的交際工具。中國歷史傳說中有一個創造文字的聖人叫做倉頡，據說是黃帝的史臣。周代通用的大篆，據說是周宣王的史臣太史籀所整理過的。古代傳說，不能認為淨是造謠。“史記”明白記載了秦始皇的丞相李斯等人改革大篆為小篆，靠政治力量來進行“書同文”的工作。兄弟民族中，西藏文是七世紀初期藏王松爭杠布命令通密桑布札參考了印度梵文字母創製的。蒙古文是元世祖時代後藏薩加地方棍噶扎勒散喇嘛造的，元武宗時代又由綽吉鄂特爾加以補充。再拿外國文字來說，俄文的斯拉夫式字母是教徒聖·西利爾根據希臘字母創製的。日本的片假名是一千二百年前吉備真備和尚拆取漢字

的部分筆劃造成的；後來空海和尚又採取草書造成平假名。所有這些史實都說明一點：文字和語言不一樣，它不像語言那樣基本上是在社會成員的生產、生活過程中自然形成的東西；它是人造的，而且當然是少數人（有時候可以是一個人）經過統整地考慮研究製造出來的。造字的人可以承受本民族的傳統加以整理、改變（例如小篆和隸書），也可以借用外國的或在一定時期內國際上比較通行的現成文字形式（例如日本採用漢字形式造字，蒙古採用俄羅斯字母），使它適合於本民族的語言。無論採取哪一種方式，文字總是若干人物製造的。這些造字的人和隨後產生的解釋、傳授文字的人，在階級社會裏必然是屬於一定階級的，因此他制作或者解釋文字的方法和見解，就難免要受他所屬的階級的影響。拿漢字來說，“奸”（姦）“婪”“媢”“妖”這些本不限於女性才有的壞品性，都算在女人的眼上，加一個“女”字旁來表示。難道這是偶然的，不是奴隸和封建社會裏重男輕女，侮辱婦女的觀念的反映麼？漢朝許慎作的“說文解字”裏面，不是有相當多的字被他拿陰陽五行之類的觀念來作了附會牽強的解釋，而歷代治文字學的人，還是把他奉作權威嗎？直到現代，不是還有一些人很熱心地想保存那一套按照古代宇宙事物分類觀念形成起來的形旁和部首嗎？

第三，文字既然是一套記號體系，人們要想應用它，就得花費相當長的時間來學習。一種文字的體系越複雜，越脫離活的語言，學會應用它就越困難，需要花費的學習時間也越長。所以，作為一種社會交際工具，文字雖然不拒絕替社會中任何一個階級服務；但是在階級壓迫的社會中，被壓迫階級所處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實際上却讓他們一般地沒有學會文字的可能。再加上統治階級故意地把持壟斷，（比如：直到清代封建社會裏，地主和他們的士大夫還在禁止奴婢、戲子、

剃頭修腳的……等被壓迫者的子女入學校唸書，參加科舉考試。婦女因為被看作家庭奴隸，一般地也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口號下，被迫不得讀書和應考。在“解放”前的美洲黑奴，沒有讀書識字的權利。如果他們中竟有人偷着讀書，經主人發現了就要挨打或者被賣掉。這樣，文字這種本來應當是全民族公用的工具和武器，結果在階級壓迫社會中被壓迫的階級大多數人却沒有條件來學習和使用。被壓迫階級中縱然有少數人也學會了使用文字，但在統治階級的壓迫和牢籠政策下，也往往要聽命於統治階級，並為他們利用。唐、宋以來的科舉制度，其目的就在於讓“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為封建貴族階級服務。因此，文字這種工具，就它的本質說雖然是全民性的，可以替各個階級服務；然而歷史的事實却指明了一點：沒有學習時間和財力的階級，總是被剝奪了使用文字的權利。一種文字的體系越繁亂，和現代語言隔離得越遠，學習到管用所需要的時間越長，應用起來的困難越多，就越容易讓處於不利地位的被壓迫階級被剝奪去使用這種文字的權利。不幸，漢字的情形正是如此。在漢字創造應用的初期，由於造字的原則條例複雜，（所謂“六書”，就是表明歷史上起碼曾經用過六種不同的原則來創造新的文字。）又因為方國、部族的語言紛歧，歷代積累，各地重出，這樣就形成了一套數量龐大，面目各異的以形表意的記號體系。秦漢以來的封建王朝，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把這種龐雜的文字神聖化，並且施用政治力量保持著它的繁複的面目不許變更。漢代朝廷曾經設立“尚書御史，史書令史”一類的官兒，專門替皇帝檢查官吏、庶民向皇帝上的表章中的文字；發現錯誤不合正體的字兒，還要“舉劾”哩！（見“漢書藝文志”）直到清代科舉場中，寫了一個錯白字，還是考不上舉人，秀才。由於兩千年來封建王朝的支持，漢字的繁雜的體系是被保存下來了；可是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的勞苦人民大

衆，却被關在漢字的門外！中國的文盲，在城市佔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在農村佔百分之八九十，其中絕大部分是工人和農民。直到解放以後，這種情形才開始有了轉變。然而，因為漢字學習較難，文盲的減少還不能很快。中國的漢字曾經為封建統治階級所壟斷，工農大眾實際上被剝奪了識字的權利。這種不可否認的事實，主要是由於經濟、政治的發展情況造成的；然而，漢字本身的繁難却也便利了封建統治階級利用有利的條件達到壟斷的目的。封建階級壟斷文字工具是事實，然而我們却不能因此推翻上述漢字本質上是沒有階級性的論斷。過去不少人誤認為漢字是封建階級性的，大部分正是由於把這種階級自外面加於文字工具的壟斷，看成了文字本身的性質。其實漢字的繁難，對於封建貴族、地主子弟也是冤親平等的。許多纨袴子弟始終兩眼墨黑、目不識丁的也不乏其人。但是一般地比較起來，貴族、地主子弟比較農民具備了學會漢字的更優越的條件。他們可以用剝削來的農民的血汗供養着，經過十年窗下的攻讀，精通漢字。而農民子弟則因為從小就要從事勞動而失掉了這種可能。這是階級的存在為學習漢字造成的外在條件，不是漢字本身具有了階級的特性。如果改變了農民的經濟地位，文字雖然繁難，他們也有學會的可能。有些翻身了的農民識字讀書文化提高就是證明。自然，漢字的繁難對於工人和翻身農民學習文化仍是一種阻礙。比如山西老區五個土地改革已完成了五年的村子，百分之八十三的青壯年參加民衆學校，經過兩年的教育，成人識二百字以下的佔29%，識五百字以下的佔13%，識九百字以下的佔18%，只有10%的成人識了一千多個字，還有30%的成人雖入民校而一字不識。根據常用字的研究和社會教育經驗，識一千字是不够用的。就算學一千幾百字，如果不能用，還只算半文盲。從這裏可以看到：漢字對於翻身農民的學習來說，實在是比較困難的。

(數字見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二版山西長治中共地委書記王謙所作報告)工人比較集中，學習條件稍微便利一點，但是生產十分緊張，也不能用很多時間來學漢字。正因為這種種理由，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

第四，在保持或改革一種文字的問題上，不同的階級是持着不同的態度的。具體地拿漢字改革問題來說吧。領導中國人民革命的毛主席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認為：“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各種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也都擁護改革文字的主張。但是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國民黨反革命政權，却想盡了種種辦法反對文字改革。他們把漢字尊為“國字”。他們把五四運動前後產生的較進步的“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改成“注音符號”和“譯音符號”，惟恐稍微沾染一點改革漢字成拼音文字的氣息；到後來連注音符號也不想要了，由吳稚暉找了六十多個筆劃繁多的漢字來拼切“國音”。他們禁止新文字運動，把新文字運動者當作共產黨員抓起來關起或殺掉。他們甚至於連把漢字改得簡單好寫一點也反對。當錢玄同等幫助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教育部選定了三百多個簡體字明令公佈全國通用時，國民黨重要反動頭子之一戴季陶在國民黨的中央政治會議上當衆跪下“為漢字請命”；結果反動政府把採用簡體字的命令又收了回去。凡此種種，都證明反動的封建資本統治階級是以保持漢字繁雜的體系不准稍微改變為有利的。革命的人民大眾可就恰好相反，他們要求把文字改得簡單好用，使它真正便利於文化“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衆服務”。打這兒可以看出來，在保持或者改革一種文字的問題上，各個階級可以有不同的意見，而且各自為了本階級的利益而互相鬥爭。

綜合上面兩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回答讀者所提出的文字有沒

有階級性的問題了。文字，就它的本質來說，是一種書面上的社會交際工具；它是全民性的，不是階級性的。但是在階級的社會中，壓迫別人的統治階級往往要影響它，壟斷它，保守它，使它變成適合於本階級應用並便於宣傳自己階級觀點的工具和武器。受壓迫的被統治階級，則往往被剝奪了識字的權利和可能，他們要為爭取文字工具更加簡易，能更為廣大的羣衆服務而鬥爭。中國漢字的形意體系雖然沒有根本的改變，但是也有幾次簡化。簡體字，俗字，常常是由商人、工匠等首先寫起的。經過人民的爭取，文字才逐漸簡易起來，使廣大的羣衆也可以應用。縱然如此，階級影響仍然不能改變文字的非階級性的本質。就是在階級壟斷下，它還是全民族公有的或公用的，不可能在一個民族內有兩種階級的文字。就讓是改革後的新文字也要具有全民性，不能只為一個階級服務。文字既然本來是全民族公用的工具，就不應當讓少數統治的壓迫階級保持不變或把它弄得更加繁難。必須把文字改變得更加簡易合理，好學好用，它才真正能成為全民族所有成員共同使用的社會交際工具和學習、宣傳的武器。

二 中國文字可否實行改革？

現在我們來解答第二個問題——文字會不會“突變”，漢字是不是必須改革？為什麼必須改革？

我們首先肯定地回答：中國文字必須改革。

道理上面其實已經說了一些了。但是有一點和有些人的看法不同，我們並不是因為肯定了它是封建階級的東西才要求加以改革。我們要求改革它不單是因為它對於工農勞苦大眾是不便利的，而且是因為它對於整個漢民族以及其他願意使用它的兄弟民族都是不便利的。

漢字改革問題的提出，不是像有人解釋的那樣，是由於什麼漢字字形和字音的矛盾。字形和字音的矛盾是任何現存的從歷史上發展下來的文字（除掉人造的世界語）中都難免存在的。這個人拿漢字字音和字形相矛盾作理由來提出文字改革，別個人也可以拿字音和字形不衝突來反對改革漢字。可見這樣提出文字改革是站不住腳的。

漢字改革問題的提出是一個歷史的必然。最正確的提法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論到文化大衆化時所作的。他指出：“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語言必須接近民衆”，其目的就是文化普及，就是使文化“為全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衆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

為什麼必須改革文字才能達到文化大衆化的目的呢？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漢字在長期發展的歷史過程中，由於種種原因，已經逐漸離開活的語言，成了一種繁難複雜的包括幾千到幾萬個不同形體的符號體系，因此成了難認、難讀、難寫、難用的一種書面的社會交際工具。要把這種工具學好，學到管用，非花費三年五載的時間不可。就讓採用速成識字法，短期解決閱讀問題，而漢字原封未動，仍會使工農大衆在學習、書寫、應用上受到很多不必要的痛苦。這對於廣大的人民羣衆和我們的兒童來說，是不利的。如果漢字的這種繁複形體對於精確表示漢語是絕對必要的，我們花費時間來學它還算值得。可是這些繁複形體不僅不能精確地表示現代漢語，反而時常成為累贅和障礙；許多人民的新鮮活潑的語詞用漢字寫不出來；好些單用漢字作語根造出來的詞彙又不便聽寫。因此必須要另找一套簡單合理容易學習和使用的記號體系來代替原有的漢字。這本來是十分簡單明白的事情，不應當再有任何爭論和懷疑的。然而文字改革提倡了幾十年，却仍然沒有成」。這主要因為以往的反動統治階級並不關心人民